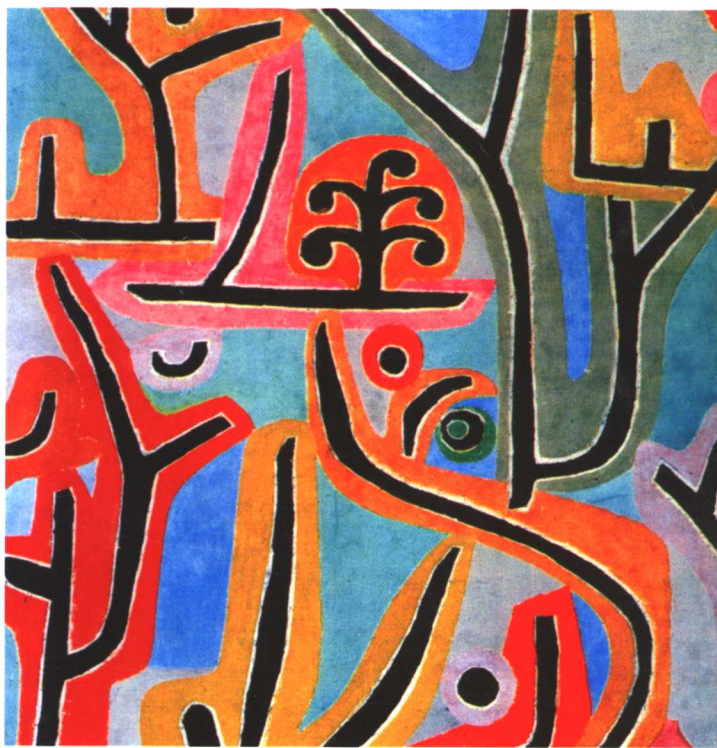


符号学译丛

尤瑟夫·库尔泰 著 怀宇 译

叙述与话语符号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叙述与话语符号学

附：A. J. 格雷玛斯《成果与设想》(代序)

尤瑟夫·库尔泰 著

怀宇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2-2001-8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述与话语符号学: 方法与实践/ (法) 库尔泰著;
怀宇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5
(符号学译丛)

ISBN 7-80563-898-5

I. 叙… II. ①库…②怀… III. 符号学
N.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7654 号

责任编辑: 史 建
装帧设计: 王伟毅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荣长海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办公室)
(022) 23003323 (发行科)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7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符号学译丛”序

张智庭

这套有关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丛书,主要是介绍法国符号学研究者对于这一新的学科或新的方法论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因此,这篇总序,也就仅限于对于符号学在法国的发展和研究现状做一简要介绍。

一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萌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但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以后的时间。它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学科在 20 世纪获得的重大进步。这当中,语言学、人类学和现象学是其三个主要的渊源。

1. 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做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 F. 索绪尔(1857-1913)。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

始的理论准备。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通过其《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两本著述,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的建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关于口语性故事的表达与内容的划分并进而为每一个方面区分出实体与形式的主张,为从科学理论上确立内容的形式描述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于叙述主体的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了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2. 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马塞·莫斯(1872-1950)是这种研究的开拓者,他1925年出版的《论赠品,古代交换形式》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价值物品与财富在社会的循环中的相互关系。列维-斯特劳斯(1908-)在1950年发表的《莫斯著述导论》一文中指出,莫斯的研究是“一种超越经验观察并达到深层真实的努力”,从此,“社会性变成了一种系统,而在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衔接、等值和蕴涵关系”。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在这方面

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实践。杜梅泽尔(1898-1986)在《神话与史诗》中以相近的术语解释了印欧宗教中众神的“三种等级功能的意识形态”。于是,一种总的结构,在不考虑个别的情况下出现了,而在这种结构中,特殊的问题也在其中找到了它们的准确位置。显然,这种原理,与符号学在话语中的研究极为相似。罗兰·巴特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社会神话研究和继而进行的叙事文的结构研究,使我们对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的关系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写到:“世界范围内的叙事文就太多了”(《叙事文的结构分析导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1895-1970)于1928年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在60年代初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的研究,格雷玛斯(1917-1992)就在其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因此,在方法论方面,人们经常把符号学与结构人类学和比较神话学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3. 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格雷玛斯曾多次引用这种表达方式,例如“显现的风帆”(《论意义》,1970,100)、“显现的银幕”(《论不完善性》,1987,78)等。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

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到：“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第8页）。当然，符号学不能被看做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相反，它远离哲学上的聚合关系，而被明确地定义为话语意指作用的一种描述性理论：当它谈论存在的时候，在语法上就是指一个状态谓语，而不带任何本体论考虑。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于1950年译成法文）和梅洛-庞蒂（1908-1961）的《感觉现象学》（1945）。他们术语中的“相象性”（*senblance*），可以说就是叙事作品中的外在形象性（*figurativité*）。甚至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两门学科的研究界限眼下已经出现模糊。

二

由于汉语中的“符号学”称谓在法语中对应于两个术语：*sémiologie* 与 *sémiotique*，所以，有关符号学的定义和理论，应该分别根据在这两个名称下进行的研究工作来阐述。应该说，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没有根本性区别，而且 *sémiologie* 早于 *sémiotique*。只是在较后的一段时间里后者使用较多，所以国际符号学学会成立时（1969年）取用了 *sémiotique* 一词。但是，从70年代开始，由于使用 *sémiotique* 一词的研究者的研究工

作出现了重大突破,随后,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便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1. *sémiologie*: 该术语本来是指医学科学中对于“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将其用来称谓对于“符号系统”的总体研究。在认识领域,该术语先是指 20 世纪 60 年代在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1896-1982)影响之下围绕着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杜梅泽尔、罗兰·巴特、拉康等)而进行的工作。随后,一些人狭隘地理解了索绪尔为 *sémiologie* 所确定的定义(例如 Prieto 和 Mounin 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符号本身的探讨,从而摆脱不了对于“语言符号”模式的机械性的运用。他们排除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的一切联系。这种研究为传播学理论所包括,最终成为语言学的附属学科。从研究内容上讲,*sémiologie* 不关心语义问题,它把对于能指的描述当做一种通常的释义活动来对待,而在这种释义活动中,自然语言是其工具。在与语言学的关系上,它不承认语言学的优先地位,因为它只强调符号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读一些非语言的符号(图片,绘画,建筑等)时,它却经常借用自然语言这种中介,例如罗兰·巴特(1915-1980)在《服饰系统》一书中,就采用了对时装的描述性文字进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对时装本身进行分析。在分析绘画作品时,它也是只限于分析绘画的描述性语言。

2. *sémiotique*: 该术语源自英文 *semiotic*,最早由美

国符号学鼻祖皮尔士(1839-1914)使用,指的也是对符号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索绪尔使用的 *sémiologie* 没有区别。现代的法国的 *sémiotique* 研究者们并不看重语言符号,认为符号是一种已经建构的对象,而不是可供观察的对象。他们更看重语义研究,努力探讨意指方式,认为符号学应该成为一种有关意指系统的理论,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作为意指实践结果的各种文本。在这方面,形成了以结构研究为主的格雷玛斯等人的学派和克里斯特瓦(1941-)的认识论符号学研究(参照语言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理论而建立的“语义分析”符号学)。前者由于研究阵容大,成果颇丰,而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学派以“法语研究学会”的成员为主,其通常的称谓便是“巴黎符号学学派”。

可以说,巴黎符号学学派的有关意指理论的基础概念,已经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中得到了阐述。按照格雷玛斯的主张,符号学(*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他把一个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对这些不同层次的确立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工作内容和成绩所在。

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

结构的组织形式,它的基本表述是:如果意指 S 在其最初被理解的平面上就像是一个语义轴,那么,它就与 $-S$ 相对立, $-S$ 在此被看成是 S 项的矛盾项。如果我们同意语义轴 S (内容的实体)在内容的形式平面上分节为两个相反的反义: $S_1 \leftrightarrow S_2$,那么,这两个分别考虑的反义就会有它们的矛盾项的存在: $-S_1 \leftrightarrow -S_2$ 。于是,意指的基本结构就可以表现为一个矩形,其中, S_1 与 S_2 、 S_2 与 $-S_1$ 是两组对立关系, S_1 与 $-S_1$ 、 S_2 与 $-S_2$ 是两组矛盾关系,而 S_1 与 $-S_2$ 、 S_2 与 $-S_1$ 是两组蕴涵关系。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

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 31 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

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

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 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

实际上,sémiologie 的研究者们从罗兰·巴特开始也已经意识到“任何 sémiologie 系统均与言语活动混合在一起”。他们进而认为 sémiologie 是话语的意指单位的科学。所以,近来的 sémiologie 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向 sémiotique 方面的变化,这样,两个术语的内涵就开始有所接近了。

三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符号学的“自立性”做出了贡献,成了世界范围内这一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它有别于美国学界进行的综合研究:在美国,虽然有着现代符号学奠基者皮尔士的巨大影响,以及有着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符号学》所在地这样的优势,但美国的符号学研究未能形成比较统一的流派,因此也就很难像法国符号学研究特别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有那么大的影响;它也有别于意大利的符号学研究:意大利早期的符号学研究受到了罗兰·

巴特的《符号学原理》的推动,随后形成了以语用学和通讯理论为基础的行为主义研究方向;它也有别于德国的符号学研究:德国的符号学研究分前东德部分和西德部分,前东德部分基本上与前苏联的研究一致,前西德部分的研究则以莫里斯的理论为基础后又融入了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它还有别于前苏联的符号学研究:前苏联自俄国时代开始就具有形式主义的研究传统,普洛普对于俄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成果后来对巴黎符号学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形式主义研究几经周折于前苏联得到认可之后,便有了劳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和巴赫金的诗学理论。

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从总的情况来讲,长时间处于“引进”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李幼蒸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1992)一书为我们全面地介绍了国外符号学发展的历史和理论概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于这一领域的最高认识水平。当然,符号学的一些相关理论在我国某些领域的应用已经开始,语言学、逻辑学、翻译理论和文学研究都对符号学程度不同地有所借鉴,但似乎还未形成较大的声势。这套丛书,将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法国符号学研究不同时期的有影响的著述,自然包括在 *sémiologie* 和 *sémiotique* 名下进行的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为我国开展符号学研究提供一些原始的参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译者不在一地,无法切磋,加之同一术语

在不同研究者那里也并非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所以,本丛书所使用的术语译名难于做到全部统一。对由此可能给读者带来的理解上的不便,我们在此表示歉意。

我们十分感谢法国著名符号学研究者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先生同意做我们这套丛书的名誉主编。我们感谢法国外交部对出版这套丛书给予财政资助,也感谢法国瑟伊(Seuil)出版社和阿榭特大学教育(Hachette Université)出版社给予的大力协助。

2001年3月

成果与设想(代序)

A. J. 格雷玛斯

0. 导言

近几年来,符号学领域取得了极为引人注目的进展,或者至少说,出现了众多的理论探索与应用——该领域不可争辩地成了话语的叙述分析的领域。有关叙述性(narrativité)的思考,曾经是普洛普^①在《故事形态学》中很快地和部分地探讨过的内容,这种思考后来导致产生了诸如“叙述学”(narratologie)这样的独立学科设想,也导致出现了匆忙建立的叙述“语法”或叙述“逻辑”。在(前)苏联或在美国,符号学家如梅勒丁斯基(E. Meletinski)或丹德(A. Dundes),他们都是尽力深入地了解限于人种-文学文本的叙述活动(narration)的内部机制。与在这两个国家出现的情况相反,法国符号学家则希望在普洛普的作品中看到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能更

^① 普洛普(Vladimir Iakovlevitch Propp, 1895-1970):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译注

好地帮助人理解叙述话语在其总体上的组成原理。对于组成叙述活动的普遍形式的存在性的假设,不管这种假设是否已经被人明确地承认或是已经默默地被人接受,在启发了多种探索的同时,它也引起了一些令人不无遗憾的误解。

这些误解中的第一种,与建立在反科学的意识形态前提基础上的和与涉及或不涉及人文科学的批评无关,它源于在具有复杂性的文学文本上对普洛普模式或是其粗俗的派生模式进行的机械运用。这种实践由于不怀疑话语形式(*formes discursives*)具有普遍性这一公设,通常便只能证实符号学所提供的方法是无效的。在这样的活动中,有两种区别很大的任务却一直混淆在一起:第一种旨在提高我们对于叙述组织形式(*organisation narratives*)的认识,并出于兴趣或是需要而采取一些演绎和形式化的步骤;相反,第二种则尽力利用对于叙述模式(*modèle narratif*)的了解,来阅读复杂和个别的符号学对象即文本,而尤其是文学文本。由于手段的贫乏而导致阅读毫无意义,是不足为怪的。

有两种无能或是不足可以解释这种情况。某些符号学家不懂得考虑杜梅泽尔^①或是列维-斯特劳斯^②的研究

① 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法国宗教历史学家。——译注

②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法国人类学家,他第一个将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用于神话的人类学研究。——译注

结果,这些结果揭示了话语的有组织的、但潜在于普洛普的表层叙述性的表现活动中的深层结构的存在。他们也忽略了去估计线型的叙述展开与被表现的文本之间的巨大距离,而这种距离,修辞学研究和文本语言学研究刚刚开始给予填补。对于一篇文学文本的阅读,由于这篇文本已经这样被减缩为它的表层叙述维面,所以最终只能表现为是贫瘠乏味的,再就是,从普洛普那里借用和多少修订过的叙述模式,越来越不适宜阐述在结构上日趋复杂的对象。

这篇文章作为介绍符号学一般问题的入门书的序言,很想在一方面指出自重新发现了普洛普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尽可能区分符号学的成果与为开辟新的研究途径所做的设想和假设的同时,说明一下它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I. 对于普洛普《故事形态学》的批判性审视

1. 描述性言语活动问题

我们不贬低普洛普的发现的重要性,但我们应该指出,他的分析结果在介绍上缺乏严密性,并且有着明显的漏洞。

a)像普洛普做的那样,说故事就是 31 种功能的接续(succession)(原文如此),这就需要提前确定“功能”(fonction)这个概念。然而,虽然我们可以为普洛普把“功

能”视为人物的“行动范围”(sphère d'action)从直觉出发感到自豪,但他有关各种功能的表述方式却经常使我们感到困惑不解:如果“英雄的出发”可以看做是与一种活动形式(forme d'activités)相对应的一种“功能”的话,那么,“缺失”^①就远不能代表一种行为(faire),而更应该指的是一种状态(état),因此也就不能被视为是一种功能。

这样一来,当我们考虑普洛普的“功能”名称目录的时候,我们的印象便是,在普洛普的思想中,这些名称在归纳故事的各种变体(variantes)和统化它们的涵义及各种语序(séquences)的同时,更多的是用来概述(résumer),而不是用来指明我们可以把故事看成是一种有组织的程序的各种类型的接续活动。于是,普洛普使用的描述性言语活动就像是一种资料性言语活动(language documentaire):我们无需向言语活动提出其他的要求,就可以对其使用几项可以控制这类言语活动之构成的简单的原理,同时首先尽力赋予这种“功能”接续一

① 缺失(manque):通常的意义为“缺乏”、“缺少”,我们结合普洛普的用法和其在符号学叙述图式中的作用将其译为“缺失”。在普洛普关于民间故事的诸多“功能”中,“缺失”是由“反英雄”的“罪行”引起的,在叙述发展中占有中心的位置:英雄的出发和他的寻找活动,使“缺失”得到了“填补”,也使“反英雄”的罪行得到了纠正。根据从普洛普的功能衍生的规则的叙述图式,“缺失”是进行寻找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析取关系(即脱离关系)的形象表达,而能使“缺失”过渡到无“缺失”状况的,则是合取(即结合)的转换作用。由此,严格地说来,“缺失”不是一种功能,而是一种“状态”。——译注